



林语堂 论中西文化

LIN YU TANG
LUN ZHONG
XI WEN HUA

万平近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林语堂论中西文化

万平近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邹越非

林语堂论中西文化

万平近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875 字数240,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

ISBN7—80515—007—9/I·5 定价:3.40元

前 言

在我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著名学者颇不乏人。林语堂虽长期远居海外，也应名列其中。固然，林语堂主要是翻译家、语言学家和散文、杂文作家，特别是在向国外译介中国古典名著方面颇有盛名，但他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作为课题之一，付出了大量劳动，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文章和演讲。中西文化的比较几乎贯穿了他的所有著述。林语堂人已作古，这些著述不论其思想观点如何，都应归入前人的文化遗产。我们须象鲁迅所指引的那样，“要拿来”，“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众所周知，林语堂早期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二十年代反对封建军阀、批判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作为语丝派的一员和革命派的同路人，曾同鲁迅并肩战斗，但他不能跟随时代前进，又屈服于黑暗势力的压力，由徬徨而倒退，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终于离开进步的文化阵营，同鲁迅分道扬镳，与他抨击过的现代评论派主要人物殊途同归。随着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的向右转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渗入强烈的政治色彩，不时发出荒诞不经之论。不过，林语堂在浩淼的中西文化的长河中汲取的知识素养倒是丰厚的，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仍有自己的见地，提出过一些不是人云亦云的说法，其中包含了不少言之成理的成分，例如早年的《机器与精神》、《谈中西文化》和晚年的《论东西思想之不同》等都属此类。我们在剔除其谬误的政治观念时，对

其言之成理的部分可以拿来作为借鉴。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一而再宣称的治学涉世之道。从林语堂的实践看来，既有真实性又带虚浮性。他广泛地涉足中西文化领域，为沟通中西文化，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例如翻译中外名著、编写英文读本及汉英词典等。这当然是真实的，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他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又大大限制了他的文化视野，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往往取表面而舍实质，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以谬误当真理，比如《吾国与吾民》就是这样。而且他的中外文化观既杂乱无章又浮动不定，时而偏东，时而歪西，时而崇洋，时而迷古，在文化的继承、借鉴和创新上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树，“两脚踏”又怎能不陷入虚浮？当然，他在杂谈古今中外、山川人物中所传播的知识也是有价值的。

林语堂在《四十自叙》中就表示“偏憎人家说普罗”，同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如出一辙。后来林语堂对马克思主义的顽固抵制和反对，较之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他谈论中西文化，是以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方面虽能起一些积极作用，在具体问题上可发一些人所未发之论，但整体上却难以得出科学的论断。他追求“东西哲理可以互通”，实际上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享乐主义和中国封建文人的玩世主义结合起来(如《生活的艺术·生活的享受》)；把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和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如《啼笑皆非·道术》)；把资本主义的“法治”和封建主义的“人治”统一起来(如《吾国与吾民·我们的出路》)。这种种结合和统一，正如同他在小说《远景》中描绘的那个二十一世纪的南太平洋中无人所知、与世隔绝的和平安宁的小

岛国，如其说是“远景”，不如说是梦境。他在文艺思想上不厌其烦地把近代西方的表现主义和古代中国的性灵说凑合在一起，也未嫁接出足以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新理论。尽管如此，在林语堂对中西文化大量的分析比较之中，仍有不少合乎情理、近于事实的部分，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溢于字里行间，对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剖析，不乏精到之笔。

时代和人是息息相关的。林语堂在《时代和人》一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除了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之外，不能不受到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在林语堂所置身的那个时代和社会谈论中西文化，只能象《谈中西文化》一文中朱、柳二先生及柳夫人的对话那样，海阔天空发发议论而已，同社会实践风马牛不相及，即使有好的见解也难以致用。因此，我们对林语堂那样生活在旧时代旧社会的学者的论著，应放在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评论，不能脱离其历史条件而苛求。

今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正确对待中外文化，依然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从前人走过的道路中总结、汲取经验教训，对我们都有裨益。本书的编选就是为这种总结提供资料之便。书中所选文章，属林语堂一家之言，曲直是非兼有，偏颇讹谬良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予以分析和鉴别。文选大体上按内容分为六辑，各辑按写作或发表时序安排。本书资料的搜集，多亏友人相助，否则难以完成。编选工作中的疏失，祈学者、读者匡正。

万平近

1987年3月30日于福建社会科学院

编 选 凡 例

一、本书选编林语堂有关中西文化的论文、演讲、短论及专书中的少量篇章，以选中文著作为主，并选少量英文著作的中译文。

二、本书选文录自原发表的报刊或作者结集的文集，并参阅几种版本（包括台湾开明书店出版的《语堂文集》）加以校勘；文中引文、译名率依原样。

三、本书选文系选全篇，不作删节，选专书的章节也保持其完整性，个别篇章中的“上略”、“下略”为作者结集时删去的套语。

四、本书选文一般不加注，文中外文词语也不作译注。少数须说明之处加题注或简注。作者原注仍保留。（题注用*，简注用①②，原注用（注一）（注二）

目 录

前言

编选凡例

第一辑 论中外国民性及其文化内涵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1
——纪念孙中山先生	
给玄同先生的信·····	4
中国人之聪明·····	9
中国的国民性·····	12
中国人与英国人·····	19
中日之国民性·····	24
一个拟科学公式·····	32
论中外的国民性·····	42
——由动转入静的儒道	
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47

第二辑 论西方批评的文化及对东方文化的批评

机器与精神·····	65
论现代批评的职务·····	74
论读书·····	84
萨天师语录·····	92
中国究有臭虫否·····	111

时代与人·····	115
谈中西文化·····	118
《西风》发刊词·····	126
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	128
——阐述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为《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序	

第三辑 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中国文化之精神·····	135
辜鸿铭·····	146
有不为斋丛书序（兼说近情主义）·····	151
思孔子·····	155
古书有毒辩·····	161
关于《吾国与吾民》·····	164
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	168
《啼笑皆非》中文译本序言·····	173
——为中国读者进一解	
再论孔子近情·····	178
孟子说才志气欲·····	182
记大千话敦煌·····	186
谈钱穆先生之经学·····	190
说福祿特尔与中国迷·····	196

第四辑 论中西文学艺术及其交流

《新的文评》序言·····	203
论性灵文学及其它·····	212
论小品文笔调·····	224
关于《人间世》·····	228

论中西画·····	232
艺术的帝国主义·····	236
中国书法·····	239
谈中西画法之交流·····	246

第五辑 论幽默及中西幽默之比较

早期提倡幽默的两篇文章·····	251
答青崖论幽默译名·····	259
论幽默·····	261
跋《西洋幽默专号》·····	275
论孔子的幽默·····	277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283

第六辑 谈中西生活及习俗

谈牛津·····	293
哥伦比亚大学·····	300
哈佛味·····	306
说耻恶衣恶食·····	307
论西装·····	309
论握手·····	314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318
瑞士风光·····	321

附 录

林语堂生平简介·····	324
林语堂中文著作简目·····	329
林语堂英文著译简目·····	330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纪念孙中山先生

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他说：“我现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后会议，也不能有多大补助。”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一般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一“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如鲁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即“思想革命”，此语诚是。然愚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思想革命”，何如说在“性之改造”。这当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难办到，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容易，欲使一情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的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澈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难怪孙先生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学说。

若由历史上求去，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乃至显的事实。中国本来也不喜欢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诅咒。若屈原、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贾谊，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诤其短见。此乃

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结果，徐先生^①的非中庸论诚是：“听天任命和中庸之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猛进》第三期答鲁迅语）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惰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即以留学生而论，其初回国时大都皆带一点洋鬼子之急躁性，是以洋气洋癖，时露头面，亦不免为同事者所觑笑，视为不识时务。由是平时久日渐少有不变为识时务及见世面之时贤。及其事务已识，世面已见，中庸不偏之工夫练到乐天知命之学理精通，而官运亨通，名流之资格成矣。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像将来的中国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要使孙中山先生像将来的中国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复兴”运动。

岂明先生已经说过（《语丝》第十九期）：“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心所为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诚然应希望大家注意。

① 指徐炳焜。

提倡“精神复兴”，我觉得是今日言论界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二五·三·二十九

（选自《翦拂集》）

给玄同先生的信

玄同先生：

我刚刚读过你《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脚拍桌子”，忍不住也来插说几句，借此可以聊补我对于《语丝》逃懒足足两个整月之过。近来正想做一点文章，适来了先生潇洒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题目没有了。

未入正题，先说一句闲话：半农先生的信里头有一句恭维先生的话而为先生璧还者（我是先读先生之“璧还”然后读半农先生之原璧。）半农想念启明先生之温文尔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先生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案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现代评论的朋友们不必固谦，因为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学者之象征也，现代评论固冠冕堂皇威仪棣棣的学者无疑，且不失其“出之太为口之”身分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进，温文尔雅，不必限于语丝，此亦犹厚眼镜（学者之象征）不必为尹默先生所独有，而可于玄同身上求之耳。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生的“欧化的中国”论及“各人自己努力变象”的话，说的痛快淋漓，用不着弟来赞一词。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惟一的救国办法，明白浅显，光明

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题发挥来多说几句。弟近有“孙中山非中国人”（即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的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弟本来以为民国通共只有一位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农先生在巴黎想起青云阁琉璃厂来，因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的谬论（只可当他为谬论）。谓：“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一句话”。此乃半农在外留学五年所致，若仅是留学一年半载，或回国天天看国内日报张三打李四，王五请赵六喝白乾的新闻，只会感觉到国内外国人太少，不会有外国人太多之叹。即以弟个人而言，今日之主张，亦系回国后天天看报之结果，此弟一年来思想变迁也。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民族的败类，又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近日孙先生之死，虽有不少的名士来奉扬，助祭，做輓联，察其语调，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为国悲戚者绝少，一若高调一唱，将来中国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败类，奴气十足，故常喜欢唱高调，尚相信高调之效力（废督裁兵略、国民会议略、护宪略、拒贿略……等等花样甚多），故此高调总为高调而不能成为事实。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败类，故尚有败类高调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的”、“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愤的痼疽，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启明先生的话）然弟意既要针砭，消除，切开，阉割，何不爽爽快快行对症之针砭术，给以根治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复兴解做“复兴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两个反对理由。第一、此种扭扭捏捏三心两意的办法，终觉得必无成效。且若我们愿意退让以求博一般社会之欢心，则退让将无已时，而中国之病，本非是退让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后可耳。（试以日本维新时代态度与中国革命后态度比较一下此点便明。）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为何物，在弟尚是茫茫渺渺，到底有无复兴之价值，尚在不可知之数，就使有之，也极难捉摸，不如讲西欧精神之明白易见也。或者唐宋中国人不如两汉中国人，两汉中国人不如周末中国人也不一定，如是则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复者，故周末尚可出一个孟轲讲“善养吾浩然之气”，及墨翟之讲兼爱，此乃其时精神未死之证。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怕话太长，姑置之，惟我觉得孔子，由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当由

大理院起诉，叫毛、郑赔偿名誉之损失。）总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然既一厄于儒墨之争，再厄于汉时十四博士之经学，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学（《大学》、《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书”，是中国之成败类自宋朝始之证），古人之精神已一无复存，此种之精神复兴恐怕不大容易讲吧，除非有一位费希特来重新替我们讲给我们听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识浅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马跑得太远了赶快收束吧。总而言之，我近来每觉得精神复兴之必要，因为无论国事或教育，所感觉进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种颓丧之空气，在此空气内，一切维新都可变出唱戏式的笑话。三十年前中国人始承认有科学输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认政治体有欧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之必要。精神之欧化乃最难办到的一步，且必为“爱国”者所诋诬反对；然非此一步办到，昏愤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愤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尝思精神复兴条件适足以针砭吾民昏愤、卑怯、颓丧、傲惰之痼疾者六，书于左方以待参考，不复多赘（这也可为不识时务之我的一点鄙见，一笑）：

1. 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2. 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他咬我一口，我必还敬他一口）。
3. 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不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论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耒耜冲打而去，未尝屯兵秣马以为之也）。
4. 不悲观。
5. 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